

# 内部控制、成本粘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吴传荣,夏冰,尹华意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文章选取 2010—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成本粘性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有所弱化;高水平外部治理有利于发挥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据此,为着力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围绕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重视企业成本管理以及改善外部治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

**关键词:**内部控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成本粘性;技术创新能力;资源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6-0056-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6.007

## Internal Control, Cost Stickiness and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Wu Chuanrong, Xia Bing, Yin huay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sampl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rket from 2010 to 2020 to analyz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cost stickiness on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ost stickiness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state-owned ones contributes more notably to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st stickiness tends to be weaken. High level external governance is conducive to leveraging the role of internal control in enhancing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ence, to strive to improve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uch efforts as refining enterprises'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focusing on cost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re expected to be continuously made.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cost stickine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收稿日期:**2023-05-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4016);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1JJ30749);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2A0220)

**作者简介:**吴传荣(1978—),女,副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创新、营销管理和知识管理等方面研究;  
尹华意(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通信作者:**夏冰(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E-mail:2640753345@qq.com

## 一、引言

我国正处在新发展阶段,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过去依赖自然资源消耗和劳动力优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暴露出诸多弊端,经济发展质量正日益受到重视<sup>[1-3]</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公司治理重要工具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防范风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当下,我国企业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挑战,通过内部控制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中兴通讯被美国制裁还是同济堂、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等上市公司被通报财务造假,均暴露出内部控制缺陷严重制约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造成了企业成本攀升,打破了原有的成本线性假设,出现了成本粘性,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sup>[4]</sup>。目前,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企业存在成本粘性现象,故维持良好的成本性态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日益重要。鉴于此,有必要将内部控制、成本粘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深入探究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期利用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去着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内部控制和成本粘性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扣除了资本、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后的贡献<sup>[5]</sup>。全要素生产率受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外部因素看,科技金融政策、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从而提高制造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sup>[6-7]</sup>;税收优惠可以弥补市场内在缺陷,通过调节企业对创新要素的投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sup>[8]</sup>。从内部因素看,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增加杠杆率可以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sup>[9]</sup>;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促进作用<sup>[10]</sup>。

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三个方面,其中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研究成果最为丰富。Lambert 等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企业运营环境良好,各种运营活动处于有效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之下<sup>[11]</sup>。实际上,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提高持续经营能力,强化识别风险能力,增强财务报表信息质量<sup>[12]</sup>。企业内部控制可以通过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缓解委托代理冲突并抑制代理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sup>[13]</sup>。内部控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因为在严格的内部控制下高管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容易暴露,收入下滑可能会抑制高管对技术创新的投入<sup>[14]</sup>。技术创新活动的时间跨度较长,并且具备较高的不确定性特征,严格的审批程序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受到了约束<sup>[15]</sup>。更多学者支持内部控制的积极影响,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兼具监督和激励机制,有助于降低道德风险和调动高管对技术创新决策支持的积极性<sup>[16]</sup>。事实上,内部控制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企业在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兼顾成本与收益<sup>[17]</sup>。

许多学者探讨了成本粘性产生的原因。高管薪酬的外部不公平性可加剧成本粘性,较高的管理能力和内部控制质量对成本粘性表现出抑制作用<sup>[18-20]</sup>。综上可知,目前鲜有系统研究内部控制、成本粘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合性成果出现。因此,本文选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期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

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通过实证检验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丰富成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其二,从成本粘性等渠道分析内部控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从而厘清内部控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路径和具体程度,为管理者运用内部控制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经验证据。

##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一)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较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技术创新能力及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有效支撑<sup>[21-22]</sup>。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兼具监督和激励机制,有助于企业降低高管道德风险和调动高管对技术创新决策支持的积极性<sup>[16]</sup>。一些企业的研发资金源于政府专项补贴,内部控制可以规范这些资金的使用,使创新风险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另一方面,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本质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基础上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有效的内部控制为弥补契约缺陷提供了可能<sup>[23-25]</sup>。有效的内部控制通过提升治理水平,优化资本结构、降低代理成本和成本粘性来规范管理行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sup>[26-27]</sup>。资金是企业非常重要的资源,内部控制为企业资金筹集和使用作出了规范。在筹资决策上,内部控制要求规避具有较高成本与较高风险的低效融资。在资金使用上,内部控制要求企业投资决策时权衡项目的收益与风险,防止出现项目资金闲置或者资金链断裂等资源配置低效现象。在资金营运过程中,内部控制要求企业关注产购销环节的资金活动,这有利于促进企业货币资金与非货币资金的高效转换,从而提升营运资金使用效率。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并维持稳定的契约关系,可以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内部控

制通过建立明晰的产权契约关系,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而且结合关联方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减少企业集团内部资源配置中“民事权”的不确定性<sup>[28]</sup>。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二)内部控制、成本粘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成本粘性源于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调整成本和代理成本,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弱化管理者对未来业务的乐观预期、削弱调整成本和代理成本抑制成本粘性,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群体决策能够弱化管理者对未来业务的乐观预期,使企业在业务量减少时尽快降低成本费用<sup>[29]</sup>。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规范供应商选择,降低企业被单一供应商控制的可能性,从而削弱企业调整成本<sup>[30-31]</sup>。企业处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下,通过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使管理者谋私空间缩小,有利于抑制管理者私利行为,减少因代理成本而产生的成本粘性<sup>[32-33]</sup>。与之相反,如果管理者决策形成了成本粘性,产生只对管理者有利的低流动性组织冗余,可能会带来另外的成本,如支付存货积压产生的仓储管理费用以及非必要人员的报酬,这可能进一步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sup>[34-35]</sup>。另一方面,内部控制通过降低成本粘性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资金支持,而且具有较高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通过外部筹资获取资金支持进而开展创新活动可能面临困难,故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实施技术创新活动。当企业面临较高成本粘性时,随着业务量的下降,企业资金的收紧程度更大,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可能更大。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有利于企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要求企业按制度进行成本开支,从而降低成本粘性,进而有效抑制技术创新行为的随意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有效的内部控制通过抑制成本粘性,可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三、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08年,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故本文选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经筛选处理后的最终样本共计15 084个。具体筛选处理过程如下:一是剔除金融企业;二是剔除样本期间上市状态异常企业和财务数据异常企业;三是剔除关键变量缺失企业;四是考虑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粘性的相关财务数据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源于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反映外部治理环境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 (二)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测算,是借鉴盛明泉等学者思路,采用ACF修正的OP法<sup>[36]</sup>。稳健性检验中,全要素生产率( $tfp$ )采用GMM法进行估计。

#####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 $ic$ )。内部控制质量的主流评价方法有两种:一是以内部控制要素为核心的评价方法;二是以内部控制目标为核心的评价方法,如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使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内部控制质量( $ic$ )。因为它是迪博公司自主研发设计,以内部控制五大目标为导向,并选取与其对应的指标,同时以内部控制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作为修正指标构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更能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成本粘性( $sticky$ )。有关成本粘性的计量模型有两类:一类是ABJ模型,一般用于研究成本粘性成因;另一类是Weiss模

型,可测算成本粘性数值,方便探讨成本粘性的经济后果。本文以Weiss模型度量成本粘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ticky_{i,t} = \ln\left(\frac{\Delta cost}{\Delta sale}\right)_{i,u} - \ln\left(\frac{\Delta cost}{\Delta sale}\right)_{i,d} \quad (1)$$

$$u, d \in \{\tau, \dots, \tau - 3\}$$

其中, $i$ 表示企业, $\tau$ 表示在 $t$ 年四个连续季度中离期末最近的一个季度, $u, d$ 分别表示在 $t$ 年四个连续季度中接近期末营业收入上升、下降的季度; $sticky_{i,t}$ 为企业 $i$ 在 $t$ 年的成本粘性; $sale$ 和 $cost$ 分别表示某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Delta sale$ 表示该季度营业收入的变化量,计算公式为 $\Delta sale = sale_{i,\tau} - sale_{i,\tau-1}$ ;  $\Delta cost$ 表示该季度营业成本的变化量,计算公式为 $\Delta cost = cost_{i,\tau} - cost_{i,\tau-1}$ 。

当 $sticky$ 值大于零时,表明企业成本费用存在粘性特征,这意味着业务收入增加时成本费用上升的幅度要大于业务收入减少时成本费用下降的幅度;当 $sticky$ 值小于零时,表明企业成本费用存在反粘性特征。鉴于成本反粘性不是本文研究内容,故只保留 $sticky$ 值大于零的样本。

##### 4.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 $scale$ ),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杠杆水平( $lever$ ),用资产负债率表示;成长能力( $growth$ ),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股权制衡能力( $balance$ ),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年终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年终持股比例之比表示;企业年龄( $age$ ),用本期期末与企业上市之日的时差衡量;外部治理水平( $external$ ),选用历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所有权性质( $property$ ),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为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与年度固定效应,模型中同时考虑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和年度虚拟变量( $year$ )。

#### (三)模型设计

本文首先设计主回归模型(2)去检验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设计模型(3)和模型(4)去检验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ic_{i,t} + \alpha_2 scale_{i,t} + \alpha_3 lever_{i,t} + \alpha_4 growth_{i,t} + \alpha_5 balanc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external_{i,t} + \alpha_8 property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2)$$

$$sticky_{i,t} = \beta_0 + \beta_1 ic_{i,t} + \beta_2 scale_{i,t} + \beta_3 lever_{i,t} + \beta_4 growth_{i,t} + \beta_5 balance_{i,t} + \beta_6 age_{i,t} + \beta_7 external_{i,t} + \beta_8 property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3)$$

$$tfp_{i,t} = \gamma_0 + \gamma_1 ic_{i,t} + \gamma_2 sticky_{i,t} + \gamma_3 scale_{i,t} + \gamma_4 lever_{i,t} + \gamma_5 growth_{i,t} + \gamma_6 balance_{i,t} + \gamma_7 age_{i,t} + \gamma_8 external_{i,t} + \gamma_9 property_{i,t}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i$ 表示企业, $t$ 表示年度; $\alpha$ 、 $\beta$ 、 $\gamma$ 分别表示待估计系数; $tfp$ 表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ic$ 表示内部控制质量, $sticky$ 表示成本粘性; $industry$ 为行业固定效应, $year$ 为年度固定效应, $\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 四、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统计结果来看,样本企业之间内部控制质量( $ic$ )存在差异,部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具有较高的离散程度,且运用OP法的估计结果整体上略高于GMM法的估计结果。样本企业成本粘性( $sticky$ )介于0.007和2.482之间,标准差较大,这意味着样本企业之间成本粘性存在较大差异。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数
$tfp$ (OP)	4.683	0.728	3.381	4.596	6.361	15 084
$tfp$ (GMM)	3.480	0.753	2.152	3.388	5.292	15 084
$ic$	0.492	0.073	0.000	0.509	0.617	15 084
$sticky$	0.500	0.595	0.007	0.250	2.482	15 084
$scale$	22.179	1.149	20.184	22.035	24.980	15 084
$lever$	0.432	0.197	0.085	0.429	0.800	15 084
$growth$	0.126	0.262	-0.426	0.096	1.012	15 084
$balance$	0.679	0.528	0.040	0.539	2.057	15 084
$age$	0.108	0.068	0.017	0.094	0.263	15 084
$external$	9.387	1.582	4.143	9.656	11.934	15 084
$property$	0.362	0.481	0.000	0.000	1.000	15 084

### (二)逐步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模型(2)–(4)的逐步回归结果。从列(1)的主回归模型结果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 $ic$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假设H1成立。可能原因是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成本粘性( $sticky$ )、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 $ic$ ),解释变量 $ic$ 的估计系数为-0.847且显著,表明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列(3)是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内部控制质量( $ic$ )和成本粘性( $sticky$ )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成本粘性( $sticky$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列(3)中 $tfp$ 的估计系数小于列(1)中 $tfp$ 的估计系数,这意味着成本粘性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根据表2结果计算,成本粘性( $sticky$ )的中介效应占比11.01%。同时,选择了 $Bootstrap$ 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成本粘性( $sticky$ )的中介效应占比11.08%,同样支持假设H3。

表2列(3)结果显示,企业规模( $scale$ )的估计系数为0.25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从外部获取资源去推动技术创新,更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杠杆水平( $lever$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举债经营现象,通过适度的杠杆可以撬动更多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成长能力(*growth*)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企业成长能力越强,发展前景越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越高。股权制衡能力(*balance*)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呈负相关关系,可能原因是较高的股权制衡能力降低了企业的决策效率。企业年龄(*a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对市场的洞察更加深入,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更合理地配置资源。

表 2 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tfp</i>	<i>sticky</i>	<i>tfp</i>
<i>ic</i>	0.785*** (8.15)	-0.847*** (-8.62)	0.698*** (7.27)
<i>sticky</i>			-0.102*** (-10.69)
<i>scale</i>	0.253*** (24.38)	-0.015** (-2.21)	0.252*** (24.50)
<i>lever</i>	0.286*** (5.41)	-0.112*** (-3.00)	0.274*** (5.22)
<i>growth</i>	0.415*** (17.82)	-0.189*** (-9.27)	0.396*** (17.15)
<i>balance</i>	-0.033* (-1.95)	0.033*** (3.02)	-0.030* (-1.76)
<i>age</i>	0.365** (2.07)	0.170 (1.59)	0.382** (2.20)
<i>external</i>	0.058*** (8.75)	-0.005 (-1.33)	0.057*** (8.77)
<i>property</i>	0.013 (0.56)	-0.055*** (-3.89)	0.008 (0.32)
常数项	-2.058*** (-9.31)	1.350*** (9.45)	-1.920*** (-8.70)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F</i>	233.462	39.466	230.787
<i>N</i>	15 084	15 084	15 084
<i>Adj. R<sup>2</sup></i>	0.435	0.056	0.442
<i>Bootstrap</i> 检验	间接效应系数		0.087*** ( <i>Z</i> =7.61)
	直接效应系数		0.698*** ( <i>Z</i> =8.82)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三)异质性分析

1. 产权异质性

产权性质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产权异质性。本文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并选择费舍尔组合方法对组间差异进行检验。表 3 报告了产权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成本粘性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从显著性水平来看,与国有企业比较,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系数对应的 *t* 值相对低些,内部控制质量的组间系数差异也通过了费舍尔组合检验。也就是说,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在国有企业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企业管理的程度不如国有企业深,致使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比国有企业低。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政府审计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发挥提供了进一步保障,可以通过加强公司治理,从而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而言,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是 14.43%和 7.31%,可能原因是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加之非国有资本的逐利动机一般强于国有资本,故在生产经营上更重视成本控制和防范成本粘性。

2. 外部治理水平异质性

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因外部治理环境差异表现出异质性。本文根据外部治理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水平外部治理和高水平外部治理两个子样本。外部治理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列(1)和列(4)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在低水平外部治理组和高水平外部治理组分别为 0.747 和 0.850,表明在高水平外部治理下的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作用更显著,这可能是我国非均衡发展模式引起的。高水平外部治理意味着国家能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信息透明度高,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推动企业公平竞争。处于公平竞争中的企业更能认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从而更加重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同时,在高水平外部治理环境下,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要求更高,对企业违规的惩罚力度更大。因此,高水平外部治理下的内部控制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中介检验方面,成本粘性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低水平外部治理组和高水平外部治理组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是 11.10%和 10.69%。可能原因是在高水平外部治理环境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较成熟,市场与政府关系和谐,企业成本粘性得到有效抑制,致使成本粘性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有所降低。

表 3 产权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i>tfp</i>	<i>sticky</i>	<i>tfp</i>	<i>tfp</i>	<i>sticky</i>	<i>tfp</i>
<i>ic</i>	1.427*** (8.51)	-0.809*** (-5.32)	1.323*** (7.94)	0.527*** (4.80)	-0.884*** (-7.04)	0.452*** (4.12)
<i>sticky</i>			-0.129*** (-7.18)			-0.086*** (-8.16)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	113.087	12.949	108.015	153.451	28.773	150.559
<i>N</i>	5 461	5 461	5 461	9 623	9 623	9 623
<i>Adj. R</i> <sup>2</sup>	0.488	0.075	0.496	0.411	0.051	0.416

表 4 外部治理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低水平外部治理			高水平外部治理		
	(1)	(2)	(3)	(4)	(5)	(6)
	<i>tfp</i>	<i>sticky</i>	<i>tfp</i>	<i>tfp</i>	<i>sticky</i>	<i>tfp</i>
<i>ic</i>	0.747*** (4.73)	-0.782*** (-4.63)	0.664*** (4.24)	0.850*** (7.04)	-0.909*** (-7.62)	0.759*** (6.32)
<i>sticky</i>			-0.106*** (-7.29)			-0.100*** (-8.00)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F</i>	105.583	13.923	107.038	159.224	32.733	152.032
<i>N</i>	7 068	7 068	7 068	8 016	8 016	8 016
<i>Adj. R</i> <sup>2</sup>	0.437	0.049	0.444	0.432	0.064	0.438

#### (四)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稳健性检验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 GMM 法进行估计。逐步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对比分析表 5 和表 2 各列结果后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

的估计系数值以及显著性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 2. 替换样本

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行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sup>[37]</sup>。分析《2020 年度中国制造业上

表 5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tfp</i> (GMM)	<i>sticky</i>	<i>tfp</i> (GMM)
<i>ic</i>	0.911*** (8.63)	−0.847*** (−8.62)	0.815*** (7.74)
<i>sticky</i>			−0.113*** (−10.79)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F</i>	132.617	39.466	132.979
<i>Adj. R</i> <sup>2</sup>	0.369	0.056	0.377
<i>N</i>	15 084	15 084	15 084
<i>Bootstrap</i> 检验	间接效应系数	0.096*** ( <i>Z</i> =7.64)	
	直接效应系数	0.815*** ( <i>Z</i> =9.67)	

市公司价值创造研究报告》和《中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白皮书(2022)》中的统计结果后发现,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0 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从 2 439 家上升至 3 313 家,在 A 股上市企业中的占比由 63.1%跃升至 65.5%,意味着我国制造企业在 A 股上市公司中占据主要地位。为验证之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仅保留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替换样本后的 *R*<sup>2</sup> 有所下降,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占比降至 7.79%,相关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及其符号仍基本保持不变,再次印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稳健性检验:替换样本的逐步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tfp</i>	<i>sticky</i>	<i>tfp</i>
<i>ic</i>	0.993*** (8.89)	−0.869*** (−7.17)	0.915*** (8.25)
<i>sticky</i>			−0.089*** (−8.82)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F</i>	159.173	25.031	160.749
<i>N</i>	10 144	10 144	10 144
<i>Adj. R</i> <sup>2</sup>	0.350	0.042	0.357

3.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故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此进行纠正。本文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作为工具变量,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6 列(1)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在 1%的显著水平上高度相关,且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故工具变量选择合理;列(2)结果显示,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之后的回归结果与表 2 列(1)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IV-2SLS 法回归结果

变量	(1) 第一阶段 <i>ic</i>	(2) 第二阶段 <i>tfp</i>
<i>L2. ic</i>	0.208*** (8.04)	
<i>L3. ic</i>	0.202*** (3.83)	
<i>ic</i>		4.382*** (5.27)
<i>scale</i>	0.011*** (6.20)	0.194*** (9.07)
<i>lever</i>	−0.079*** (−8.84)	0.659*** (5.39)
<i>growth</i>	0.061*** (10.32)	0.213*** (2.82)
<i>balance</i>	−0.006** (−2.49)	−0.027 (−0.86)
<i>age</i>	−0.043 (−1.57)	0.855*** (2.61)
<i>external</i>	0.002** (2.48)	0.037*** (3.17)
<i>property</i>	0.009*** (2.74)	−0.034 (−0.94)
<i>N</i>	3 617	3 617
<i>Adj. R</i> <sup>2</sup>	0.199	0.134
<i>Endogeneity test</i>	25.664***	
<i>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i>	67.705***	
<i>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i>	58.438***	
<i>Hansen J statistic</i>	0.150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落脚点,选择修正的OP法和GMM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分析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成本粘性在其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有所弱化。高水平外部治理有利于发挥内部控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市场微观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通过探讨内部控制、成本粘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执行,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直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企业有必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执行。虽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文件对内部控制规范性作出了指引,但部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仍不够。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弥补企业契约关系的不足,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去降低交易成本,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体来说,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可以围绕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奖惩制度与反馈机制等方面发力。

第二,重视企业成本管理,密切关注成本性态变化,有效抑制成本粘性,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且成本粘性在内部控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故重视企业成本管理,密切关注成本性态变化,减少成本

粘性现象,这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意义。虽然企业实际经营中无法全面解决成本粘性这一普遍性问题,但通过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尽量保持良好的成本性态,有效抑制成本粘性,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关注业务收入变动引致的成本费用变动,并对未来成本费用作出合理预期;通过有效的成本管理,将成本费用变化与业务收入变化的不对称性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减少成本粘性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以及技术创新挤出。具体来说,重视成本管理可以从合理分配企业资源、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入手。

第三,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改善外部治理环境,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最主要的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我们必须通过着力推动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去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在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增强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其发展状况与外部治理环境密切相关,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健全法治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 【参考文献】

- [1] 魏文江,谢戈扬. 高质量发展理论综述及展望[J]. 理论建设, 2021(6): 71-77.
- [2] 阳立高,罗朋,李玉双.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抑制还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 76-88.
- [3] 戴翔,沈佳倩,占丽. 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36-48.
- [4] 李兰,王锐,彭泗清. 企业家成长30年:企业家精神引领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30年调查综合报告[J]. 管理世界, 2023(3): 113-136.
- [5] 宋冬林,孙尚斌. 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式解读[J]. 上海

- 经济研究,2023(2):36-50.
- [6] 路春城,王翠翠,姜常梅. 政府补贴、创新投入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3(1):50-61.
- [7] 阳灿,刘明显,刘忍妹. 科技金融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J]. 武汉金融,2022(10):33-41.
- [8] 燕洪国,潘翠英. 税收优惠、创新要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2(2):85-97.
- [9] 傅晗彧,陈丽娜. 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构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2022(11):142-154.
- [10] 王京滨,刘赵宁,刘新民.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检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1-11.
- [11] Lambert R, Leuz C, Verrecchia R 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 45 (02): 385-420.
- [12] Altamuro J, Beatty A. How does internal control regulation affect financial repor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49(01-02): 58-74.
- [13] Cheng M, Dhaliwal D, Zhang Y. Does investment efficiency improve after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3, 56 (01): 1-18.
- [14] Zhang I X.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01-02): 74-115.
- [15] 张娟,黄志忠. 内部控制、技术创新和公司业绩: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经济管理,2016(9):120-134.
- [16] 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 (05): 1043-1075.
- [17] 刘浩,许楠,时淑慧. 内部控制的“双刃剑”作用:基于预算执行与预算松弛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15(12): 130-145.
- [18] 吴成颂,田雨霁. 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6):52-61.
- [19] 张路,李金彩,张瀚文,等. 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成本粘性吗?[J]. 会计研究,2019(3):71-77.
- [20] 牟韶红,李启航,陈汉文. 内部控制能够抑制成本费用粘性吗:基于信息视角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 当代财经,2015(2):118-129.
- [21] 刘和旺,袁震宇,郑世林.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44-50.
- [22] 吴静桦,王靖茹,刘建秋,等. 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的微观证据[J]. 会计研究,2021(4):145-156.
- [23] 刘明辉,张宜霞. 内部控制的经济思考[J]. 会计研究,2002(8):54-56.
- [24] 林钟高,郑军.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 会计研究,2007(10):53-61,96.
- [25] 徐新华,黄小勇. 内部控制制度的产权因素分析[J]. 财会研究,2006(3):64-65.
- [26] 李燕京,孙义新,董萍,等. 论企业内部控制意义及相关措施[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8):223.
- [27] 田林鑫.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D]. 西安:西京学院,2022.
- [28] 唐大鹏,李渊,楼丽娜,等. 以内部控制制度构建财会监督的确定性规则[J]. 财务与会计,2021(10):41-45.
- [29] 胥朝阳,李子妍,赵晓阳. 内部控制质量、成本粘性与公司财务绩效[J]. 财会通讯,2021(18):71-74.
- [30] 陈旭,邱霞. 成本粘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10):103-112.
- [31] 于浩洋,王满,黄波. 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与成本粘性[J]. 管理科学,2017(3):122-135.
- [32] 孙贺捷,王北辰.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成本粘性[J]. 工业技术经济,2021(6):71-76.
- [33] 李万福,林斌,宋璐. 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效率促进还是抑制?[J]. 管理世界,2011(2):81-99,188.
- [34] 叶陈毅,管晓,陈依萍,等. 成本粘性、低流动性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研究[J]. 会计之友,2020(14):95-102.
- [35] 邬雪,杨勇. 组织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风险和经营效率的双重中介作用[J]. 商业研究,2022(4): 97-107.
- [36] 盛明泉,张娅楠,胡之逊. 企业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8-80.
- [37] 方辉振,王辉龙. 振兴我国实体经济的重点、难点与“痛点”[J]. 现代经济探讨,2017(4):5-9.